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神学与哲学

〔德〕潘能伯格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神学与哲学

——从它们共同的历史看它们的关系

〔德〕潘能伯格 著

李秋零 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2 年年初已先后分十三辑印行名著 5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四辑。到 2012 年年底出版至 6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0 月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哲学老师：

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洛维特(Karl Löwith)

中译本导言

一、潘能伯格其人及其著作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是当代德语基督新教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潘能伯格 1928 年出生于当时德国的什切青城(Stettin),该城位于柏林之东,原为普鲁士的波莫瑞省(Pommern)的首府,1945 年德国战败后被划归波兰。潘能伯格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退出教会,因而他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基督教的环境中成长的。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文学、历史、音乐等。直到 1944 年,潘能伯格才开始接触哲学,尤其是尼采的作品。1945 年 1 月 6 日的主显节,潘能伯格从学校回家,途中被落日的余晖所深深吸引,面对大自然的奇妙,潘能伯格顿然感到宇宙的浩瀚和伟大,感到自己的渺小,从而产生对永恒的向往。此时的潘能伯格尚不能解释这番感受,但他已意识到这将是 he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几个星期之后,潘能伯格被穷途末路的纳粹政权征召入伍,短暂受训后却由于身染疥疮而被送到德国北部的医院,而一同受训的同伴却被调派到东线作战,于苏军渡过奥得河(Oder)后战死。1945 年春,盟军攻入德国北部,潘能伯格成为英军的俘虏,直

到1945年夏德国战败后才被释放。^①十七岁的潘能伯格重返学校,并开始对基督教信仰发生兴趣,于同年皈依基督新教。

1947年春,潘能伯格进入柏林洪堡大学就读哲学与神学,1948年秋转往哥廷根大学,1949年秋获普世基督教协会奖学金赴瑞士巴塞尔大学进修,1950年秋又转往海德堡大学。这种丰富的求学经历使潘能伯格能够受教于当时的一大批名师,例如在哲学方面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洛维特(Karl Löwith)等,在神学方面有巴特(Karl Barth)、拉德(Gerhard von Rad)、施林克(Edmund Schlink)等。潘能伯格曾对巴特神学发生浓厚兴趣,但他觉得其中缺乏哲学成分和人文气息。洛维特的历史哲学也对潘能伯格的思想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据潘能伯格自己表示,拉德和施林克对他的影响最大。拉德的释经学使他对《旧约》中的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和传统发生兴趣,并把《圣经》研究与系统神学紧密结合起来。而施林克则使他对神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哲学和自然科学对话发生兴趣。潘能伯格后来的思想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信仰、理性、历史并重的特点,无疑与这些老师的影响是有关的。

1953年,潘能伯格在其导师施林克的指导下,以《经院哲学学说发展关联中的司各脱预定说》(Die Prädestinationslehre des Duns Scotus im Zusammenhang der scholastischen Lehrentwicklung)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55年以《类比与信仰:对关于上帝的

① 参见郭鸿标:《潘能博的生平及神学思想简介》,载《思》第59期,1999年1月,网址:http://www.hkci.org.hk/Reflection/No.59/59_theo_sketch.rtf。

知识中类比概念的历史的一种批判性研究》(Analogie und Offenbarung;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Geschichte des Analogiebegriffs in der Gotteserkenntnis)的论文获得大学执教资格,出任海德堡大学编外讲师,同年接受按立,成为海德堡大学教堂牧师,从此开始了他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1958年,潘能伯格前往乌帕塔尔(Wuppertal),任教会大学系统神学教授,与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共事三年。1961年,他出任美因茨大学系统神学教授,1967年参与组建慕尼黑大学新教神学系和普世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除了教学活动之外,潘能伯格还作为信义宗神学家,对罗马天主教持欣赏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和推进与天主教的神学对话以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1994年,潘能伯格在慕尼黑大学荣休。

潘能伯格勤于写作,著作等身。据慕尼黑大学新教神学系在网上公布的潘能伯格1953—2000年发表作品清单,竟达六百四十五项之多^①(当然,其中有一些是同一作品的再版和转译。潘能伯格的许多著作都一版再版或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等)。这里当然不能全文照录,只能择其要者如下:

- 《作为历史的启示》(*Offenbarung als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61)。

^① 参见网页《潘能伯格1952—1998年发表作品目录》(Bibliographie der Veröffentlichungen von Wolfhart Pannenberg 1953—1998),网址:<http://www.evtheol.uni-muenchen.de/oekumene/p-pannenberg-pub.htm>。该目录实际收录已至2000年。

- 《人是什么？——从神学看现代人类学》(*Was ist der Mensch? Die Anthropologie der Gegenwart im Lichte der Theologie*, Göttingen, 1962)。
- 《基督论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der Christologie*, Gütersloh, 1964)。
- 《系统神学基本问题》(*Grundfragen systematischer Theologie, Gesammelte Aufsätze*, Göttingen, 1967—1979), 共有三卷, 均为论文集, 多收录潘能伯格此前发表的论文, 但也有新撰而未发表过的。
- 《神学与上帝之国》(*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hiladelphia, 1969)。德文版:《神学与上帝之国》(*Theologie und Reich Gottes*, Gütersloh, 1971)。
- 《上帝观念与人的自由》(*Gottesgedanke und menschliche Freiheit*, Göttingen, 1972), 论文集, 收录和整理潘能伯格此前发表的论文。
- 《科学理论与神学》(*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Theologie*, Frankfurt, 1973)。
- 《伦理学与教会论》(*Ethik und Ekklesiologie*, Göttingen, 1977), 论文集, 多收录潘能伯格此前发表的论文, 但也有新撰而未发表过的。
- 《人性、拣选与历史》(*Human Nature, Election and History*, Philadelphia, 1977)。德文版:《人的规定——人性、拣选与历史》(*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Menschsein, Erwählung und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8)。

- 《信仰自白》(*Das Glaubensbekenntnis*, Hamburg, 1972)。
- 《神学视角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theologisch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1983)。
- 《形而上学与上帝观念》(*Metaphysik und Gottesgedanke*, Göttingen, 1988)。
- 《系统神学》(*Systematische Theologie*, Göttingen, 1988—1993), 共有三卷。
- 《神学与哲学——从它们共同的历史看它们的关系》(*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Ihr Verhältnis im Lichte ihrer gemeinsam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96)。

与潘能伯格的著作等身和学术声望相比,其著作的汉译相当落后。据笔者所知,目前其著作只有两个汉译本:

- 《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译,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书,1994年。
- 《天国近了——神学与神的国》,邓绍光译,香港基道书楼,1990年;实际上是英文版《神学与上帝之国》的汉译。

另外就是散见于刊物、汇编中的节录、文章了,如《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十二期(2000年春)的《基督论的基本问题》(摘自《基督论的基本特征》导论)、第十九期(2003年秋)的《救赎事件与历史》(论文,译自《系统神学的基本问题》)等。

二、潘能伯格的神学思想

早在学生时代,潘能伯格就曾对巴特神学只强调上帝的言而缺乏哲学成分和人文气息表示不满,并在拉德的影响下,与一些同学自行组织学习小组,试图将拉德的释经学引入系统神学的讨论。即使毕业之后各奔东西,他们的合作研究也没有中断。1961年,这个小组的研究成果作为论文集以《作为历史的启示》为题发表,“马上在颇为沉寂的德国新教神学圈子里,引起一时的震动。该论文集……被神学界恰当地理解为一股新神学概念的方案式宣言”。^① 作为该论文集的编者,潘能伯格由此声名鹊起,论文集的作者们被称为“潘能伯格圈子”,由此形成德国第一个不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辩证神学为范本的神学派别,也发展出潘能伯格神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对历史的特别关注。今人研究潘能伯格的思想,多称他的体系为“历史的神学”,本文多有援引的《现代神学家——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导论》(*The Modern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亦把他与莫尔特曼一起归在“历史与终末论”一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神学新观点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圣经》的传统,上帝并不直接地启示他自己(例如,在其‘圣言’中),而是间接地透过其在

^① 福特编,董江阳、陈佐人译:《现代神学家——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导论》(香港:道风书社,2005),第177页。

历史中的作为。”而且“这不是指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一连串的事件。这只能应用于历史的结局,就是所有先前的事件,实质上为整个实在得以被显明”。^① 这样,潘能伯格的启示观就带有明显的终末论的特征。但潘能伯格认为,上帝在历史中的这种间接的自我启示,预先地实现于拿撒勒人耶稣的终极目的性中,或更具体地实现于耶稣的复活这个历史事件中。因此,神学应当从耶稣自己的历史实在出发,自下而上地达至耶稣基督的神性,从耶稣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出发达至上帝。

潘能伯格的这一新神学方案马上招来了批评。“在《作为历史的启示》出版后,战后德国神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巴特学派与布尔特曼学派,对在新历史神学中所隐含的对‘上帝之道神学’的批评做出强力的反应。一方面,巴特派强调需要以上帝在其三重圣言中的直接启示,来解释神圣的自我启示,从而否定潘能伯格的概念为一种新的神学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布尔特曼的追随者则抱怨新历史神学误解了基督教福音宣讲与人存在历史性之间的关系,并指责潘能伯格在重构一种陈腐而抽空之历史形而上学。两派均指责潘能伯格使基督教信仰依靠着历史研究的结果,并在尝试确立此基础时,牺牲了神学反省的独立性。”^②

然而,潘能伯格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在他看来,神学不仅应当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而且还必须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相融构,并且在多元文化的思想处境中,承担起整

① 福特编:《现代神学家》,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合各种知识的任务。为此,潘能伯格广泛涉猎其他非神学学科,科际对话构成了他的神学思想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其著作《科学理论与神学》主要探讨神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是什么?——从神学看现代人类学》和《神学视角中的人类学》则探讨神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而《形而上学与上帝观念》、《神学与哲学:从它们共同的历史看它们的关系》则集中探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哲学,潘能伯格对其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以致反对派攻击他说,他是在以哲学来申明一种暗藏的哲学理论。但在潘能伯格看来,基督教神学必须具备哲学的反思,“从历史来说,哲学肇始于希腊诗人描述对希腊宗教神祇之批判。从系统思维来说,每当哲学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之自然意识,对我们关于世界与自身之多元经验,提出整体性与一致性问题,那哲学与神学主题便彼此汇合。相反地,如果神学要论证独一上帝是世界与我们自身一致性之终极视界,神学便经常需要糅合哲学思维”。^① 在1996年出版的《神学与哲学》中,潘能伯格强调指出:“没有对哲学的全面认识,人们就既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学说如何历史地形成,也不能达到对基督教学说在当代的真理断言的一种独特的、有根据的判断。缺少了有哲学素养的意识,人们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在向独立形成判断过渡的意义上——完成从对《圣经》的历史批判诠释向系统神学的过渡。”^②

然而,对于潘能伯格来说,哲学思维毕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

① 福特编:《现代神学家》,第183页。

② 见本书第5页(指中译本,下同)。

的,潘能伯格主张科际对话的根本目的是用神学整合散乱的各种知识,是建立其庞大的系统神学体系。“虽然哲学与神学之间是彼此依附的,潘能伯格却劝告其读者不要理解其神学为一种独立哲学系统之宗教表述。他视哲学反思基本上是作为神学之设准功能,而非其基础功能,借此为充分阐述思想领域中之宗教信仰实在观,提供了一种批判而建构性之设准。但是神学却是本于上帝在历史中之启示,由此呈现所有之实在均是植根于上帝之实在,并由此而完成在哲学上掌握实在之一致性。”^①于是,潘能伯格三大卷的《系统神学》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在这部著作中,潘能伯格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对历史、对理性的重视依然清晰可见,但也表现出一些重心的转移。例如在基督论中,潘能伯格过去强调自下而上的基督论,而如今则强调自下而上的基督论与自上而下的基督论的结合,着重从三位一体学说的进路来构建基督论。鉴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介绍潘能伯格的系统神学思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福特(David F. Ford)编的《现代神学家——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导论》第十一章中的“系统神学”一节。

三、潘能伯格的《神学与哲学》一书^②

据潘能伯格自述,《神学与哲学》(下文引用,仅在正文中标出

① 福特编:《现代神学家》,第184—185页。

② 此部分压缩自拙文:《基督教神学的哲学情结——潘能伯格的〈神学与哲学〉一书评论》,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3期(2005年秋),第247—256页。

中译本的页码)是“我数十年来定期讲授、一再修改、最后于1993—1994 学年冬季学期在慕尼黑作为我的正式学术讲授之结束而开设的一门讲演课的手稿”(第1页)。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它们共同的历史看它们的关系”。它说明,潘能伯格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是纯粹按体系进行,而是依各哲学体系的历史顺序及其在基督教教学中的接受来取向”(第1页)。该书大体上由五大板块组成。

第一章:哲学与神学之关系规定的各种类型

关于神学和哲学在历史上的关系之规定,潘能伯格总结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神学与哲学对立。潘能伯格在这里举出了这种关系规定的始祖德尔图良以及他的名句:“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学园与教会有什么相干?”此外还有中世纪的达米安枢机主教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但是,潘能伯格指出:“所有这些神学家尽管对于哲学言辞激烈,却都绝对不拒绝、不避免在神学中运用哲学。……作为神学与哲学之间的一种根本对立的见证而得到援引的这些观点,若加以更详细的考察就表现出,启示信仰与哲学之间、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张力的,但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关系”(第17—18页)。第二种类型:基督教是真哲学。其代表是殉教士游斯丁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这一语式实际上表明,神学否认哲学是神学之外的一种独立的真理,信仰被解释为智慧的真正形态,而哲学按照其概念的词义仅仅是寻求智慧。第三种类型:神学作为超自然启示的知识高于作为自然知识的最高形态的哲学。其代表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

奎那。第四种类型：哲学关于上帝的自然知识高于神学。其代表是启蒙时代的英国理神论和康德。潘能伯格的总结是：“对立的观点从未作为特有的历史立场扮演过一种独立的角色，而是始终仅仅作为要素出现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立场中，把哲学扬弃在神学中的意义上把二者等同，成为一个时代，亦即基督教的教父学时代的典型，而使哲学附属于神学，则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志。把这种附属逆转为哲学高于神学，是启蒙运动思维的特征”（第 25—26 页）。此外，潘能伯格还举出了施莱尔马赫使信仰基于情感而不附属于理性的权威的尝试和黑格尔通过把宗教观念扬弃在哲学概念中而使哲学吸取信仰的内容的尝试，这两种倾向都以哲学理性的自律为前提条件，就此而言以启蒙运动的基本立场为前提条件。

第二章至第四章：“基督教对柏拉图主义的接受”、“亚里士多德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基督教思维与斯多亚哲学的关系”

第二章至第四章集中探讨古代哲学在基督教思维中的影响史。“在基督教神学产生和最初发展的时代里，古代没有任何一种别的哲学像柏拉图主义那样深刻地影响了它。在这方面，仅仅说柏拉图主义思维对基督教的一种‘影响’是不够的。毋宁说，这涉及一个创造性地接受和同化的过程”（第 33 页）。这主要涉及三个主题，其中首先是柏拉图关于神（世界本原）的学说。其次是柏拉图主义的与神相似的生活理想。最后是认识与光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最初是被教父时代归入柏拉图学派而一起接受的。而自十

一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迎合了时代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求知欲。基督教对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最高的奴斯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的学说改造,付出了比改造柏拉图学说更多的气力。斯多亚学派关于逻各斯、普纽玛、预旨、作为赞同的信仰、自然神学与自然法、良知、理性控制情感的伦理学等等,都经过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性改造,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章:基督教对哲学的主题构成的贡献

“基督教神学接受了哲学的思想,但基督教也就其自身而言改变了哲学的意识”(第 111 页)。基督教信仰开辟了对现实的一种新理解,无论是世界及其属神起源的现实,还是人的现实。对人和世界的这种新理解的某些视角,也成为哲学思考的主题。“属于此列的有世界及其所有部分的偶在,人的个体性的一系列视角,特别是人的人格性。此外还有历史作为一个不可逆的、对未来开放的过程的发现,对无限者作为世界的属神起源的本质规定的积极评价。最后,虽然不是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信仰本身,但却是这一信仰的一系列作用,特别是对理解人的自由的作用以及对爱与和解的概念的作用”(第 111 页)。

第六章至第十章

这一板块实际上由三个子板块组成。第六章(“近代文化从基督教解放”)主要讨论近代文化产生的进程。潘能伯格认为:“古代在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中的恢复绝不已经意味与基督教的决裂。对文艺复兴的这种由布克哈特确立,特别是由尼采鼓吹的解释,以

充足的理由受到驳斥。基督教本身吸取了古代的遗产,并把它转交给北欧皈依基督教的各个民族。因此,返回到古代并恢复古代——从哲学和各部门艺术直到教父们——可以在基督教内部来完成”(第 138 页)。近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基督教神学的一种世俗化罢了。第七章(“对于近代早期来说决定性的哲学新端倪及其神学上的重要性”)集中探讨了十七世纪两个突出表现为划时代的观点,即笛卡尔对形而上学的更新和洛克所建立的经验论哲学,在潘能伯格看来,此期的其他哲学观点都可以被归于它们的影响。笛卡尔哲学的新东西在于如下论题,即对无限者的直观是关于有限者、包括自己的自我的一切知识的条件,与此相联系在于从奥古斯丁的自我确定性思想出发对上帝存在所做的新证明。“笛卡尔没有把他著名的上帝存在证明直接建立在自我确定性之上,而是建立在以对自我的意识为前提条件的无限者观念之上。但是,自我确定性毕竟构成了这方面的出发点。上帝存在的一个证据从无限者作为对有限内容的一切把握的条件的先验先在性出发来阐明,哪怕是沿着无限者与完满者的同一性的道路”(第 155 页)。笛卡尔的学说虽然没有赢得神学家的多少掌声,但却引起了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进一步思考。洛克拒斥了上帝的天赋观念,但却肯定了对上帝的知识的确定性。“我们直接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本身与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一样是有限的。对我们自己的有限性的这种知识如今已经包含着关于上帝的思想;必定有某种东西亘古以来就存在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从无中产生的”(第 174—175 页)。因此,信仰作为对启示的同意,在原则上绝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完全理性的,是建立在最高的